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张 澜

陈麟辉 张春美 编写 新华出版社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 问：王首道 康克清

主 编：苏双碧

副 主 编：陈君聪

编 委：李 捷 曹宏遂

周道荣 宋镇铃

马宝珠

责任编辑：郑丽敏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张 澜

陈麟辉 张春美 编写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燕山联营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5印张 27,000字

1991年5月第一版 1991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ISBN 7-5011-1014-X/K·149 定价：1.00元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张 澜

陈麟辉 张春美 编写

目 录

一、立志教育救国·····	1
二、四川保路运动领导人·····	7
三、反对帝制复辟·····	12
四、从开明教育家到共产党人的挚友·····	18
五、就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	24
六、反对蒋记独裁统治·····	31
七、迎来中华民族的新生·····	37

一、立志教育救国

张澜，字表方，1872年4月2日（农历二月二十三日）出生于四川省南充县中和乡张光沟。他的父亲叫张文倬，中过秀才，在南充是一个有点名气的读书人，有四子七女，张澜在弟兄中排行第三。在那个苦难深重、激烈动荡的社会环境中，祖传不足四亩的田产和他担任塾师的微薄收入，怎么也养不活一群嗷嗷待哺的子女。这位读书人便在张澜年少时迁至西充县永安乡召善沟，一面设馆授徒，继续从事他的塾师职业，一面又向地主租种了几亩薄田，勉强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张澜自小随父半耕半读。读了四书以后，他又读五经，打下了较好的国学根底。汉族传统的民族主义，也就在他思想上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常常对同学说：“我们读书，不是为了给清政府效忠，我们的目的，是要使自己成为有用的人材，在将来为汉人扬眉吐气。”他在学习之余随父进行田间操作，亲身体会了贫穷农民的辛勤和疾苦，养成了艰苦朴素、克勤克俭的生活作风，并在他幼小的心灵中萌发了热爱人民的深厚感情。

1894年，张澜应试科举，考中秀才。按理来说，自小随父饱读经书的张澜还可以循中国一般士大夫的道路继续走下去，求取功名利禄。但是，19世纪末中国社会政治局势的新变化和自小养成的对清朝统治者的仇恨，强烈地撞击着张澜年轻的心灵，使他挣脱了封建经典教义的束缚，走上了救国

救民的道路。

那时候，腐朽的清王朝在外国侵略者的打击下，正日趋衰落。就在张澜考中秀才的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貌似强大的大清帝国，居然被蕞（zuì，最）尔小国日本打败。这一强烈的震动惊醒了一代中国人。它使人们擦亮了眼睛，看到了中国不仅比西方各国落后，而且赶不上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如果再不进行全面的革新改良，难逃亡国灭种的厄运。于是，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变法图强的维新运动逐步兴起，西方新学在中国广泛流传。从这时起，张澜开始接触新学，知识范围日益宽阔起来，渐渐走出了传统思想的牢笼。不久，维新变法运动就告失败，对年轻的张澜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他痛恨慈禧太后反动腐败的政治统治，同情维新派的主张和行动，痛惜“戊戌六君子”的牺牲，开始寻找救亡图存的新方案。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呢？张澜仔细考察古今中外社会发展的历史，向往有志改革的勇士，他认为，社会发展需要各种人才，没有大量革新的人才，社会的革新改良就无法进行。投身教育，培养人才，改革社会的理想蓝图在他头脑里渐渐清晰起来。教育救国成了张澜最初的志向。

在与四川维新人士蒲殿俊等人进行了一番创办紫荇（xìng，幸）书院的教育救国实践后，1902年，早已忍不住在穷乡僻壤当塾师的张澜东渡日本，留学东京弘文书院师范科。这是一所专为中国留日学生设立的学校。张澜和当时许多青年学生一样，把留学看成是探寻救国真理的好机会。因此，

他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课外各类爱国活动上，成为爱国留日学生中的一位活跃分子。教育救国的理想和日本通过维新走上富强之路的现实，使张澜在政治上倾向于君主立宪，希望通过社会改良的办法实现中国的富强及人民生活改善的美好愿望。他赞成梁启超的改良主义主张，但坚决反对慈禧太后把持朝政，囚禁光绪帝的行径。

1904年秋后的一天，东京中华留日学生集会，正逢慈禧太后70岁生日就要到来，一些思想顽固保守的留学生按照清政府在日爪牙的旨意，在会上大谈慈禧太后对中国的种种功劳，提议为这位老太后祝寿。站在台下的张澜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愤，跃上讲台，慷慨激昂地逐一诉说慈禧太后专横无道、搜刮百姓、残害维新志士的种种罪状，呼吁人们不但不能向她这样的独裁者、杀人狂祝寿，而且应该要求她立即退朝，还政光绪，变法维新。张澜的主张立即引起了一部分中国留学生的强烈共鸣，清政府在日本爪牙想通过留学生祝寿邀功的计划顿成泡影。张澜在留学生中的威信与日俱增。可是在清政府爪牙的眼中，他却成了一个大逆不道、十罪不赦的坏学生，张澜很快就被清政府爪牙押解回国。这是张澜学业的不幸，而这不幸却又提前把张澜推上了社会的舞台，开始了他教育救国的实践活动。

张澜回国后，先在四川顺庆府官立中学堂任正教习并讲授修身课。按照他的教育救国的理想蓝图，张澜吸收了日本的学校制度，制订了一套全新的学校规章制度。在教学中，他还常常讲帝国主义到中国侵略如何凶狠，清政府多么腐败

和屈膝媚外，国家的前途多么危险，老百姓的日子多么痛苦等道理，启发学生的爱国觉悟，勉励学生要奋发有为，努力学习，将来救国济民、振兴中华。张澜的教学实践给相对闭塞的西南吹进了一股清新的时代新风，学校面貌也为之一新，闻名遐迩。川北各地许多青年纷纷赶到顺庆府中学堂求学，朱德当时是这批求学学生中出类拔萃的一员。1906年后，张澜先后担任四川省游学预备学堂学监、东文学堂学监，继续实践他教育救国的理想。在他看来，将要担负起救国救民重任的学生必须具备良好的身体，为此，他十分重视学生的体育训练。1906年春夏，他联合成都的几所学校，在南校场举行学生运动大会。在那时候，运动会还是一件新鲜事，消息传开，十分轰动。成都成千上万的群众赶到南校场观看。当时的官厅杯弓蛇影，最防百姓聚在一起，生怕会闹出什么事情来，派了大批巡警维持秩序，与参加运动会的学生发生了冲突。巡警棒打鞭抽，大打出手，顷刻间就打伤了许多学生。张澜闻讯立即同一批教师赶到冲突地点，在群众的支持下，才算制止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看着一个个被打得躺在地上呻吟的学生，痛苦的泪水顿时模糊了张澜的双眼。为锻炼学生身体却让学生受到了这样的摧残，作为负有保护学生之责的教师，张澜挺身而出，联合刘士志、罗伦、徐子林等成都教育界人士，联名向巡警道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巡警向学校和学生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这类事件。可是，在那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时代，势孤力单的教育界人士哪里斗得过作恶多端、蛮不讲理的官府，专横无礼的巡警道不但

不到学校向学生赔礼道歉，却反过来诬告学生闹事、扰乱社会治安。作为教师居然无力保护自己的学生，张澜再也克制不住内心的不平和愤怒了，毅然辞去了成都两校的教职，回到家乡南充主持地方教育工作。

与成都相比，南充是个小地方。张澜把他的新教育思想带到这里，先后创办了民立两荣小学和南充县高荣小学，还兼任顺庆府中学堂监督，继续开展教育救国的实践活动。

清末，女子还有缠小脚的陋习，它不但严重摧残了女子的身心健康，而且束缚了女子参加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由。张澜决心冲破这一残酷的封建旧礼教。他一到南充，就大讲妇女天足的道理，创办端明女校，鼓励妇女读书。这可激怒了当地的封建保守势力，什么“败坏风气”、“大逆不道”等等的帽子一顶顶向张澜飞来，女子也很少敢走出闺房，到张澜办的学校中读书。面对保守势力的百般阻挠，张澜发动中小学生，组成宣讲队，四处宣传女子上学的好处，介绍成都等地女子上学的情况，还想方设法让女学生在校中学得一门可以谋生的技艺。经过一番努力，端明女校的学生一天天多起来了，反对女子上学的声音也一天天低落下去，妇女解放的风气终于在南充形成了。张澜脸上露出了成功的微笑。

张澜在办学中，十分重视启发学生的爱国思想和注意与贫苦百姓的联系，了解他们的疾苦和要求。有一次，他了解到南充知县邓隆强行征收粮税的情况，非常气愤，便联合地方人士发动了抗交浮粮浮税的斗争。邓隆开始没把这个教书先生放在眼里，想用抗粮罪名打击张澜。清朝，抗粮是犯杀头

的大罪。老百姓怎会答应让替自己说话的人坐牢？他们很快组织起来，聚集在县衙门外，同声斥责邓隆的倒行逆施，要求取消加在张澜头上的罪名，否则就天天包围县衙门。被群众围得焦头烂额的邓隆还算知道众怒不可犯的古训，只得乖乖地撤消了张澜的罪名。事后南充流传了一首反映这一事件的民谣：

满天云雾盖果州，七品知县面带愁，

督邮怕见张三面，官府无奈表方何。

表达了人民对张澜尊重和敬佩之情。经过这次斗争，张澜在南充的声望也越来越高。

1909年10月，四川省咨议局成立，南充民众公推张澜为咨议局议员。早就看穿了清政府假立宪闹剧的张澜，为了继续发展他在南充开创的事业，实践自己立下的教育救国理想，坚决不就咨议局议员职，专心致力于南充的教育事业。后来，四川省提学使刘某为了借重张澜在教育界的威望，提出擢升张澜任学使司等要职，也被张澜婉言谢绝。但是，列强的侵略，清廷的腐败，很快打破了张澜美好的理想。他看到了只有推倒腐朽的清廷，赶走凶狠的侵略者，才能实现发展教育、救国救民的愿望。日益高涨的保路运动正呼唤着爱国志士起来斗争，张澜立即挺身而出，加入了斗争的行列，成为四川保路运动的中坚人物，开始了投身民主革命的一生。

二、四川保路运动领导人

1911年，腐败的清政府为了筹集经费，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采纳邮传部尚书、买办官僚盛宣怀的建议，下令将各省经过斗争已经收回并准交商办的铁路干线，一律收归“国有”，再将它抵押给西方列强，用以举借外债。随后悍然派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南下接收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的铁路公司。湖南绅商首先起来反对清政府的卖国行径，四川人民奋起响应，坚决维护川汉铁路的权益，将保路运动推向高潮。

川汉铁路的股本，原来是四川督署按田赋和丁粮附加征收而筹集的，因此，四川人民都是川汉铁路的股东。清政府出卖路权，不但使外国势力侵入到了中国的腹地，而且直接损害了四川人民的利益，激起了四川各阶层人民的愤怒。1911年5月，四川咨议局长蒲殿俊、副议长罗伦提出了“废约保路”的口号，成立保路同志会，发动四川保路斗争。保路同志会利用合法手段，展开了和平请愿斗争，他们从光绪帝生前颁布的上谕中，摘录“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两句作为斗争口号，发动成都市民要求清政府放弃国有，准归商办，并派代表赴京请愿。四川总督王人文也奏请朝廷暂缓接收，以俯顺民情。但是清政府一意孤行，不仅将王人文革职，而且任命素有屠户之称的赵尔丰为川督，将川省赴京代表解回籍。消息传来，四川全省震动。8月5日，保路同志

会在成都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股东特别会议，宣布成立股东会，选举颜楷为会长，张澜为副会长。会上，新到任的总督赵尔丰花言巧语，说四川人民太穷，负担已经很重，要一口气筹足筑路的资金很不容易，朝廷在深思熟虑之后，为了减少川民的负担和加快铁路建设的速度，所以才向外国人借款筑路。赵尔丰讲完这样一番话，到会的士绅怕背“犯上作乱”的罪名，一时无人起来反驳，会场一片肃静。蒲殿俊正想请罗伦上去反驳，张澜已昂然站了起来，走上讲台，侃侃而谈。他说，朝廷在租税以外，还用肉捐、酒捐、糖捐等形式搜刮四川百姓，并且捐税年年都有增加，从不顾及四川百姓的艰难。今天政府明明是夺取我们四川百姓的筑路权利，却说是体恤四川老百姓的艰难，这能够骗谁呢？中国有詹天佑那样的人，完全可以把铁路建造起来。今天朝廷不相信中国人却相信外国人，使外国人控制经济命脉，再出兵侵略，结果中国将会像朝鲜那样，饱受亡国之祸。张澜又说：哀莫大于心死，如果四川股东的心都死了，或者没有心肝，那尽可以回家去享家庭的幸福。如果股东的心未死，我们大家一定要同心协力，誓死保路废约！张澜的话，大长了股东们的志气，股东们一个个争着上台发言，表示坚决不做亡国奴，宁愿忍饥挨饿，也要筹足路款，自己筑路。会议很快决议罢市、罢课。四川保路运动的声势越来越大，保路同志会也很快发展到10余万人。同时，罗伦在川西各县组织保路同志军配合股东大会并肩作战，使保路运动的斗争之弦，越拉越紧，逐步形成了带有全民性的武装大起义。9月6日，股东会再次集会，

散发《川人自保商榷书》，声明将联络各省发动更大规模的斗争。

赵尔丰因自己在股东大会上的讲话被驳得体无完肤，对张澜等保路运动领导人恨之入骨，有了逮捕迫害张澜等人的准备。9月6日，他看到了《川人自保商榷书》后，便以为抓住了把柄，指控保路同志会准备造反，加紧策划镇压保路运动的阴谋。当然，他不敢堂堂正正地逮捕保路运动领导人，于是便密谋了一条诱捕的毒计。

9月7日，蒲殿俊、罗伦、颜楷、张澜等九人接到了去督署看邮传部关于川汉铁路路权电报的邀请，力争路权的张澜等人自然便一起赶往督署。谁知道他们刚踏进督署花厅，埋伏在里面的一群士兵便一涌而上，将张澜等人五花大绑起来。一会儿，躲在幕后操纵的赵尔丰走了出来，声色俱厉地说：“将铁路归国有，是朝廷的旨意，怎么可以随便更改？你们几人借题发挥，聚众反抗，妄图造反，是要杀头的！”张澜听了，哈哈一笑，愤怒抗议说：“既然朝廷有旨，‘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这就要算数的。我们代表四川人民争取路权是正义的，只有那些出尔反尔、出卖路权、引狼入室、危害国家的人，才是真正有罪的人。”张澜的话，理直气壮，气得赵尔丰面红耳赤，拍案大叫：“张澜太横强！”并立即命令士兵把刀架在张澜的脖子上，用枪抵着张澜的胸膛，做出一副要立即处决张澜的架势。张澜毫不退缩，大声抗辩说：“我代表川民股东，痛苦深，故呼吁烈，怎么是横强蛮干？”赵尔丰被驳得理屈词穷，哑口无言，便当即喝令士兵将张澜

九人囚禁在督署中，加以“抗命朝廷”之罪，“候者听斩”。

张澜等人被捕的消息传出后，成都全城震动。当日上午，就有成千上万的人扶老携幼到督署请愿，要求释放蒲、罗、颜、张等人。当时的封建礼教，皇帝说的话是圣旨，谁也不能违背，而川汉铁路归商办，是光绪批准的，尽管这时光绪已死，大家认为抬出死光绪来，还是可以镇住赵尔丰的，市民们便捧着光绪的牌位，人人手里拿着一炷香，念着“庶政公诸舆论，铁路仍归商办”的口号，从成都各个角落浩浩荡荡地涌向督署。面对如此壮大的群众队伍，气急败坏的赵尔丰已经顾不得皇帝牌位了，悍然下令预先布置好的卫队开枪屠杀，当场打死32人，伤者无数。造成了震动全国的成都惨案。

成都血案发生后，是夜即有同盟会员曹笃、朱国瓚等人发出“水电报”，即将写着“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的木牌投入江中，顺流而下，将消息传递给沿江群众。曹笃并立即到川南地区进行宣传鼓动。噩耗传开，全川人民立即行动了起来。成都附近10多个县的20多万保路同志军兼程开赴成都，将成都团团围困。赵尔丰几次派兵出击，次次都是败退回阵。走投无路的赵尔丰便想利用张澜等人在群众中的威望，想以此平息人民起义。他跑到看守所，假惺惺地向张澜等人赔礼道歉，表示只要张澜等人认个错和答应劝阻群众的斗争，就放他们出去。最后又以威胁的口吻劝张澜等人不要不识抬举，错过机会。可是，张澜他们早就置生死于度外，他们蔑视赵尔丰的威逼利诱。

张澜他们临威不惧的品格，给了赵尔丰当头一棒。这

时，清廷派来增援四川的鄂军，又在资州发动兵变，就地正法了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不久又传来了武昌起义的消息。赵尔丰惶惶不可终日，为了缓和局势，给自己留条后路，被迫在11月1日将张澜等人全部释放。张澜等人取得了保路运动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张澜他们出狱后，立即投入了争取四川独立的斗争。在全国许多省份宣告独立的形势下，赵尔丰看到了清廷大势已去，自己下台不可避免，便只求能保全性命，下台做得体面一些。结果由赵尔丰提出《四川自治方案》作为下台的台阶。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正式宣告成立，蒲殿俊任都督，朱庆澜任副都督。清王朝在四川的封建统治宣告结束，轰轰烈烈的四川保路运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12月8日，蒲殿俊在东校场阅兵时，在赵尔丰策划下，巡防军士兵借口索饷，突然发动兵变，赶走了蒲殿俊。赵尔丰又以清廷封疆大臣的名义蠢蠢欲动，调兵遣将，妄图夺回政权。革命党人尹昌衡率军平定兵变，继任都督，张澜立即建议他速除赵尔丰。尹昌衡采纳了张澜的建议，12月22日，处理赵尔丰的群众大会在成都南较场召开。张澜在群众的推举下上台，历数赵尔丰的罪状。当他讲到“赵‘屠户’不让我川民废约保路，杀我人民群众，实属罪不容诛”时，会场上立即掌声雷动，“把赵尔丰杀了！”“杀赵‘屠户’！”的怒喊声此起彼伏。这时，不知是谁先喊了声：“到都督府请求去！”愤怒的人群便如潮水般涌到了都督府。一身军人装束的尹昌衡早已威严地站在法堂，用十分洪亮的声音向群众说：“民贼

赵尔丰提来了，他杀了我们很多四川无辜百姓，血债太多！现在他还敢调兵来杀我们百姓！大家说，如何办他？！”堂上堂下大声高呼：“杀！杀！杀！”尹昌衡当即下令：“将赵尔丰大辟！立即行刑！”

四川保路运动也就胜利结束了。张澜满怀希望，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三、反对帝制复辟

新时代到来了，可新时代并没有像张澜想得那样美好。在成都人民宣告四川独立，建立大汉四川军政府的同时，重庆人民也进行了推翻清王朝在四川统治的斗争。1911年11月22日，蜀军政府在重庆宣告成立。四川一时出现了一省两个政府的局面。1912年4月，统一的四川军政府宣告成立。但是，因政权初建，人心浮动，四川的局势仍比较混乱，军政府决定设立五道宣慰使署以察吏安民。张澜出任川北宣慰使，驻在南充。他一到南充，便大力进行奖廉惩贪、除暴安良的工作。他组建了一个护卫营，调杨森任营长，刘湘任副营长，鲜英任参谋，巡视川北各地，安置散兵游勇，整编保路同志军，并办起川北团练传习所，挑选优秀青年集中训练，作为安定地方的有生力量。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川北的地方秩序渐渐稳定了下来，张澜也因此川北的声望越来越高，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1913年4月，张澜被川北地方人士推举为中华民国众议

院议员。那时，北京政府成立的参议院和众议院，仿照英美两党制的政治体制，想建立一党在朝执政、一党或多党在野监督的制度。因此，想对国家大事有点发言权，就必须参加一个政党。在这种情况下，张澜打消了他“君子无党”的主张，在1913年6月参加了进步党，从而与梁启超、蔡锷等进步党领袖交往十分密切，并与蔡锷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张澜认为，蔡锷公正廉洁，有勇有谋，是当时中国难得的人才。为了表示他对蔡锷的敬佩，他将他二儿子张慕良改名为张锷，要求他多向蔡锷学习。那时，袁世凯复辟的风声已传遍北京的大街小巷。张澜常常与蔡锷在一起议论国事，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动向都十分警惕，相约一旦有人复辟，两人就共举义事，坚决维护共和体制。

1914年1月，袁世凯加快了帝制复辟的步伐，以非法手段解散国会，整个北京城被笼罩在一片阴云之中。张澜深感在这乌烟瘴气的北京城，还不可能有所作为，于是便返回南充原籍，创办南充县立中学。他常常在课堂上向学生揭露袁世凯的复辟野心，要求学生树立民主共和的坚定信念，反对任何人的复辟的阴谋，并向川军驻南充的混成旅旅长钟体道借了500支枪，不声不响地开始训练学生军，积蓄反袁的力量。12月12日，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公布接受帝位的“诏令”。12月25日，已经返回云南的蔡锷、李烈钧、唐继尧等人联名通电全国，宣告云南独立，武力讨袁，率护国军兵分三路向四川、贵州、广西进军，揭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消息传来，张澜兴奋不已，连连赞赏蔡锷的胆

识，并积极争取钟体道等人，筹划讨袁事宜。1916年3月28日，川北护国军总司令部在南充成立，由钟体道任总司令，张澜任政务长，罗伦任参谋长，发表通电，宣告川北独立，响应蔡锷讨袁。顿时，川北、川西的大部分武装民团参加了讨袁斗争，南充中学的学生军也冲锋在前，成了讨袁的生力军。张澜还派出罗伦，到内江瓦解收编袁世凯心腹、四川将军兼巡按官陈宦的部将张鹏武团，把钟体道混成旅扩充为师，威震川北，有力地牵制了袁世凯的讨伐军，使原来驻川的北洋军不敢轻易调动，为蔡锷的护国军在泸州、纳溪、宜宾的战斗中得胜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了给袁世凯以致命的打击，张澜在组织武装斗争的同时，积极策应袁世凯在四川代理人陈宦倒戈。希望陈宦认清形势，不失时机地加入反袁斗争的行列。陈宦眼看袁世凯大势已去，不得不接受张澜的劝告，在5月22日宣布四川独立。不久，袁世凯的另一亲信汤芑铭在湖南宣布独立，沉浸在登基做皇帝梦幻中的袁世凯终于尝够了众叛亲离的滋味。在举国的讨袁声中，1916年6月6日，专制独裁的袁世凯终于带着他还没有做完的梦幻忧惧毙命。

袁世凯死后，共和恢复，黎元洪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7月6日，北京政府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蔡锷到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举荐张澜为四川省嘉陵道道尹，主持川北政务。不久，蔡锷积劳成疾，决定去日本接受治疗，由罗佩金代理督军，戴戡代理省长，刘存厚任帮办。刘存厚自恃是川军中首先响应护国军的起义者，早就对四川独立后没